

建立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的长效机制

董维明

在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,明确提出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6个方面的政策举措,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。当前,化解民企流动性风险、支持民企实际发展也成为金融界关注的话题。

民营企业“融资难、融资贵”是多因素造成的

一直以来,“融资难、融资贵”问题是阻碍民企发展的“绊脚石”,广大中小企金融融资困难、渠道单一、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沉痾已久。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曾多次召开专门会议,并出台多项支持措施,但是由于各种原因,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。客观而言,这是中国特有国情与市场环境共生的结果。

一方面,在金融市场中,民企一直是“弱势群体”。在信贷市场,各大银行纷纷给国企最优惠贷款利率,而即使在民企经营状况优于国企情况之下,反而普遍上调民企贷款利率,不仅增加了民企财务成本,同时也挫伤了民企规模扩张积极性;在债券市场,发债准入门槛高,民企由于国有背景加持,评级基本都能过关,而民企往往比较吃亏,同等条件评级上不去,发债成本也高出同等评级的国企很多,同时各大投资机构还“嫌弃”民企资质问题,导致民企债券销售难度增大;在股票市场,民企IPO发行往往历经千辛万苦,投资人也百般挑剔,股票估值与发行规模受限,同时增发、可交换(转)债等再融资审核周期明显长于国企。

另一方面,金融市场对于民企与国企的“嫌贫爱富”,并不是天然挑剔,而是更多来源于风险控制与现实教训。民企的系统性风险,来源于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先天不足,存在于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与应变措施的缺失。数据显示,2017年以来,部分以传统生产制造为主的民营企业,受原材料价格上涨、人力成本上升、中美贸易摩擦等内外部因素影响,生产利润下滑,现金流周转困难,银行信贷、债券发行、股票质押等融资渠道相继出现违约、爆仓等情况,而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拿出合适且有效的化解措施,导致今年以来民企出现“违约潮”,让涉身其中的金融机构苦不堪言,纷纷加大对民企借贷资金回笼清收力度。

对于金融机构来说,支持民营企业发展,不能走过去政策导向“扶贫”的老路。因为从短期看,对被“救济”的民企来说是“饮鸩止渴”;从长期看,对于培育健康的市场理念与引导正确的市场预期毫无帮助,甚至会给我金融体系带来新的风险隐患。

实现民企稳定融资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双赢

新形势下,面对民企融资与发展难题,应探索纾解民企“融资难、融资贵”的长效机制,实现民企稳定融资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。

一是建立金融机构支持民企融资发展政策与机制的顶层设计框架。首先,明确支持援助民企范围,即重点优先支持关系国计民生基础性与符合产业转型朝阳行

业、适合当地发展需要且保障当地群众就业的行业等符合要求的民企,确保不产生新一轮房地产泡沫、产能过剩、扩大库存等问题;同时,明确支持援助民企的原则,即是支持民企实体发展,而不是救助民企实际控制人或者大股东,所需资金必须用于化解民企的股票质押平仓风险、债券到期兑付风险、贷款换旧借新风险等流动性问题,保障支持民企正常经营活动,不得用于股东套现,不得将资金挪作他用等,避免实际控制人或者大股东套现走人,留下新的不良坏账等风险隐患。

二是兼顾国有金融机构政策扶持引导与商业化运作的双重职能。支持民企发展,不能不讲商业盈利条件,也不能造成金融资源浪费,更不能形成国有金融资产流失。对于由于当前内外部因素造成流动性风险与经营压力的民企,应该毫不犹豫进行扶持,帮助其渡过难关,重新恢复生产秩序,确保企业能够正常经营;对于存在行业过剩、盲目扩张、效率低下、经营不善等自身问题的民企,应该尊重市场规律,既不提前抽贷也不新增投放,实现正常市场优胜劣汰。

三是坚持风险控制先导的原则,坚决贯彻金融行业“去杠杆、控风险”的监管思路。确保支持民企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,不扩大过剩产能及库存,不违背金融行业监管政策,不导致金融行业二次风险。支持救助民企不能以宽松条件去解决问题,反而应当是以严格条件去化解危机;自身经营决策失误、不注重风险管理的民企及其股东自身要承担相应代价。同时,

要建立择机退出机制,救助经营困难的民企,并不是要改变其所有制性质,而是要帮助其渡过难关,所以当受救助的民企恢复正常经营后,有关机构必须正常择机退出,确保支持救助的阶段性,同时实现国有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。

四是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去解决问题,控制市场与操作风险。随着金融与科技广泛结合,可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手段,建立基于互联网的企业增信与信用担保体系,从目前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中,甄别出那些经营良好、有较大发展前景、征信良好的民企,实施精准有效投放,真正做到对民企“敢贷、能贷、愿贷、好贷”;同时,通过信息技术的强大手段,实现对广大民企的分类、分层与分级全覆盖,同时在存贷比、准备金率、资产规模、信用评级、信用担保等方面设立不同风控模型与标准,建立更加科学的市场准入机制,为民企提供切实有效的金融服务。

五是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监管思路,贯彻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精神。在监管层面,应通过实地走访与调研,了解民企实际困难,分析上下游关联企业疑虑,充分考虑潜在性风险,出台更加精准措施,做好有效调控与定向松绑;机构层面,应因地制宜,量体裁衣,针对性设计切实可行的方案与开发尽快落地的产品。政府层面、监管层面与执行机构都要切实注重实际操作性与可持续性,确保金融支持民企不走过场,不打折扣,让民企实实在在得到实惠,让中央政策实现战略性落地。(作者单位: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)
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笔谈

坚持“五个突出”提升监督质效

李光辉

监督是党章和宪法赋予各级纪委监委的第一职责。把好监督第一道关口,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具有重要意义。面对监督全覆盖的新任务新要求,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应当突出重点,牢牢把握监督的政治属性,探索创新监督方式,增强精准有效监督的能力,不断提高监督质效。

突出政治监督,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。纪委监委是政治机关,坚决落实“两个维护”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。要坚持在纪律监督、监察监督、派驻监督、巡视监督中突出政治考量,从政治上发现、纠正和处置问题,促进党员干部树牢“四个意识”,坚定“四个自信”,践行“两个维护”,坚决杜绝“七个有之”。要围绕政治生态修复、净化、建设,通过“带电”“长牙”的监督,既治“病树”、拔“烂树”,又关注地方政治生态,护好整片“森林”。要突出对“关键少数”的政治监督,切实强化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政治意识、政治方向、政治立场,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心同德,对党绝对忠诚,坚决清除“两面派”“两面人”,确保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。

突出改革融合,注重纪法贯通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,纪委监委要依纪依法履行好纪检监察双重职责,应当更加注重在监督中体现人员融合与纪法贯通。要通过深度融合,把检察院转隶干部法律素养、执法水平较高,单兵作战能力强的优势,与纪委监委执纪审查能力强、团体作战意识强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,做到“1+1>2”。要坚持纪严于法,纪在法前,让纪律“高压线”不间断通电,通过标准更高、要求更严的监督,使党员干部队伍更加纯洁。要进一步通过组织创新、机制创新、制度创新,堵塞党纪与国法衔接漏洞,消除执纪执法盲区。要围绕案件移送、证据转化等,建立健全与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公安机关以及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衔接协作机制,畅通与金融、通讯等部门的查询协调机制,把纪法贯通贯穿于监督全过程。

突出“监督的再监督”,让主体责任不空转。纪委监委的监督重点是对职能部门主体责任、监管责任是否履行到位的监督。要当好“裁判员”,坚决避免在一些专项活动中成为“运动员”,防止“监督变牵头、牵头变主抓、主抓变负责”。要聚焦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、教育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、社会关注度高、具有垄断性和专业性的行业和领域,通过“体验式监督”等方式发现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政策、执行群众纪律等方面的问题线索,实施“微创手术式”执纪审查和监察调查,摸清行业腐败的底数,及时制发纪律检查建议或监察建议,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履行监管主体责任。要围绕中央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、精准扶贫、污染防治”“三大攻坚战”的决策部署,充分发挥专责监督作用,对贯彻落实不力、失职渎职等问题严肃问责,倒逼责任落实。要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,通过建立健全廉洁扶贫专项行动指挥部、廉洁扶贫信息公开阳光监督平台、村组廉洁扶贫民情信息采集员等制度机制,以及“实地监督+网络监督”、发放“廉洁扶贫”监督卡、交叉检查、随机抽查等监督方式,持续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,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保障。

突出惩治和教育相结合,体现刚柔相济。纪委监委监督的目的是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,是通过惩治极少数,教育和管住大多数。一方面,要把监督全覆盖体现在案件办上,持续加大审查调查力度,清除政治污染因子,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。要通过分析具体个案的查办过程以及对重要案件的“复盘”,找出潜规则以及腐败发生的规律,采取“扎紧篱笆”“堵住后门”等有效措施,消除监督盲区,补齐监督短板。另一方面,要注重转变监督方式,用好“四种形态”,盯住党员干部的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,开展党风廉政建设“政治关爱”式全覆盖谈心谈话,变“背靠背”函询为“面对面”面谈,抓早抓小、治于初萌,使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,体现监督的力度、精度和效能,让纪委监委成为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理念、政治意识、政治素养等方面经常性保养的政治“4S店”。

突出自我监督,严防“灯下黑”。纪检监察干部是党的纪律、国家法律的执行者、捍卫者、监督者,必须主动自觉接受更严更实的监督。要坚持以党章和宪法监察法为根本遵循,严格遵照党的原则、纪律、规矩和法定权限、规则、程序办事,在线索处置、初步核实、审查调查、案件审理等重要环节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。要加强机关党建,发挥好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,在审查调查专案组设立临时党支部,做到审查调查工作开展到哪里,党组织的教育监督管理就延伸到哪里。要常态化开展干部家访活动,加强对干部“八小时以外”的监督,严格规范纪检监察干部行为。要探索形成独特的属于“纪律部队”的纪检监察文化,激发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荣誉感。要以刀刀向内的勇气,对执纪违纪、执法违法的行为进行坚决查处,对失职失责的严肃问责,经常打扫庭院,坚决清理门户,维护好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坚定、担当尽职、遵纪守法、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。

新时代家庭教育要及时更新

陆士桢

近年来,全国妇联发布的“十三五”家庭教育发展规划,以及各部委颁发的相关文件,明确了家庭教育的一些基本方针:家庭教育是家长的法定责任;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承担主体责任;家庭教育以提升家长素质为核心、坚持儿童发展为本的方向;重视家风建设,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家庭教育;家庭教育要坚持学校、家庭、社会紧密协作的整体格局。所有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人,在观念和意识上要不断传播这些理念,并在工作中要掌握家庭教育的具体实施原则。孩子们生长于开放的中国,他们与外界的接触比我们想象的多,新时代的家庭教育要有新内容。

在家庭教育中陪伴很重要。陪伴就是喜欢并经常与孩子亲近,乐于和孩子一起解决困难。现在父母陪伴缺失严重,有些人一味在物质上满足孩子,但很少陪伴孩子,没有沟通和引导,孩子容易走上歧途。现在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,家长不太会鼓励孩子。我们需要以孩子为本的鼓励,就是依照孩子的程度制订合理的目标,多鼓励他为目标做的努力。

教孩子干事也是目前家庭教育中非常缺失的。我认为派活也要派事,即给孩子一个岗位。我曾告诉一个学生,让她3岁的孩子摆筷子。一次我去她家,孩子对我说:“奶奶,我们在家里特别重要,我不摆筷子,他们都没法吃饭。”在家里给孩子一个岗位,他会考虑我怎么做得更好,这样能够让他会干事、有担当。

以“孩子的规则”思考问题。所谓孩子的规则,就是不能仅仅用成人的想法来教育孩子,要研究孩子,了解孩子的规则以及他们的变化。

家庭中要有明确的规范可循。一些社区做寻找我们的老规矩、老家风的活动,让孩子们春节去访问自己的长辈,了解自己的家风、自己家历史上有名的人物。事实证明,家风、家规是很好的教育元素。

一个家庭不能缺少相亲相爱的氛围,一家人经常要有坐在一起表达爱意、温暖和支持的时间。比如一周里有几天有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表达温暖、信任和支持的时间,不用很长,但从日常生活出发表达关切、爱。如果每周家里都有这样的活动,孩子长大后肯定是温暖的。

正确的教养方式、做民主型的父母很重要。美国家庭教育专家提出权威型、放任型、溺爱型、民主型这四种类型的教养方式,它适用于世界范围内各种制度下的家庭。权威型父母,苛求、体罚孩子,孩子长大后胆子小、神经质,但充满暴力倾向。放任型父母很少管教孩子。很多干部的孩子处于放任状态。我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某省会城市的人大常委会主任,他说:“我是留守儿童。我11岁时父亲去援疆,等他回来我都20岁了,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几回。”有些家长虽然事业成功,但对孩子关爱很少。家长对孩子放任不管,一方面导致孩子任性、无法无天,另一方面他们特别渴望得到情感,依赖性很强,到了青春期,只要有坏的团伙勾引,给他一点温暖就会跟着走。溺爱型父母,实际上就是家里面没有规则,使得孩子没有规则意识,到了社会上经常碰壁。民主型父母,给孩子充分表达的权利。在这种民主氛围下,能培养出有爱心、自尊、自主、自立的人。

我们可以在学校倡导一项活动,把这几种类型父母的方式和行为表现列出来做成量表,让每个家庭自评并交流体会,然后制订建设民主家庭的计划,父母和孩子共同参与,共同推进。这项活动对家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

做家庭教育指导工作,首先要智慧。这是一件有难度的事,因为改变家长的观念、提高他们的素养并非易事,而且中国家庭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大,所以要有智慧。同时要有善心,我们做的是造福儿童、造福中华民族、造福国家发展的善事,所以要有良善之心。(作者单位:中国青年政治学院)



日前,电视剧导演郭靖宇实名举报其执导的电视剧遭遇收视率“黑幕”,他的公开发言又一次掀起了行业对收视率旧疾的激愤。被收视率造假雾霾笼罩并非朝夕之事,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甚至已经成为行业里半公开的秘密。收视率造假背后往往伴随着片方与电视台的“收视率对赌”,不同档次的收视率意味着天差地别的收购价。(据《每日经济新闻》) 张建辉图

培育数字企业 加快数字转型

周宏仁

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,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。70多年来,随着全球信息化的飞速发展,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加,重要性越来越突出。当前,顺应时代潮流,当务之急是推动数字转型,通过发展数字企业,加快发展数字经济。

企业数字转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

2016年1月,世界经济论坛与艾森哲公司合作,发表了题为《产业界的数字转型:数字企业》的白皮书。其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,目前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,已经从提升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主要角色,快速演变为基础创新和创造的赋能者,成为支持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主要角色。许多人认为,这是信息化时代来临的标志。当前,发展数字经济,必须大力培育数字企业;但数字企业并非从天而降,而是由推动现有企业实现数字转型而成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数字转型与数字化转型不是一个概念,前者强调的是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型,而后者强调的是企业运行模式的转型。就好像任何商业模式都有可能数字化,但是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并不等于数字商业模式。如果将二者混为一谈,就有可能错过了数字转型的机遇。

“大物云”是企业实现数字转型的技术基础

当前,信息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,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全球物联网、云计算(“大物物云”)成为新一代信息化的四大技术基础。

其中,人工智能是智能化的目标技术,科学技术含量比较高;大数据和云计算是信息化普及应用的主要技术手段;而全球物联网(包括现在快速发展的5G移动通信技术)则是最具广泛性的基础应用和切入点,是“大、云、智”赖以进一步发展的应用基础。

四大技术的发展,正在重构全球一体化的“计算”架构体系。相应地,也正在重构基于云计算、物联网和边缘计算的全球网络结构。全球物联网的任何一个终端,即人、机、物,都将成为这个全球计算架构体系的“分子”,而“计算”和“智能”将从“分子”开始。在这个架构体系下,计算、数据、智能将无所不在。

这四大技术中,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全球物联网的发展。人、机、物都要接入物联网,意味着全球任何有联网意义的产品和服务都必须具有信息感知、智能计算、自动识别和联网的功能。换言之,全球每一个生产有联网意义产品的企业家,都必须考虑自己产品的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改造问题,也就是企业实现数字转型、改造成为数字企业的问题。全球物联网正是企业实现数字

转型的最佳抓手,拒绝数字转型的企业有可能在数字大潮的竞争中淘汰出局。

数字转型将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企业面临的最为艰巨和严峻的挑战,是关系到每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之战。一个非数字企业改造为数字企业的过程,就是这个企业实现数字转型的过程。其中,最重要的是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型,即由传统商业模式转变为数字商业模式。与之相应,企业的运行模式也必须转型为数字运行模式,即基于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运行模式。商业模式和运行模式的转型,必然导致企业人才结构和核心技能的转型,即数字技能和人才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。

物联网的发展为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提供机遇

企业的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发展,是中国信息化发展中最薄弱的一环,不少中小企业尚处于信息化绿洲环绕的沙漠之中。

统计数据表明,当前全球信息化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,而我国只有大约60%以上的企业部署了企业信息化系统。其中,一半以上只开发了办公自动化(OA)系统,而建设和使用企业资源计划(ERP)系统的企业不到30%,使用客户关系管理(CRM)系统的企业不到26%。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组织进

行的“关于中、美、德、日、英、韩、法、俄、印9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”表明,尽管在“个人类数字应用”中,中国排名第三,但是在“企业类数字应用”中,中国却敬陪末座,排名最后。这说明,广大的中国企业,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字转型,既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极好的机遇,也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所面临的紧迫而严峻的挑战。

在当前新一代信息化的四大技术基础中,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有能力去问鼎大数据、云计算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创新发展。工业4.0和工业互联网,是企业特别是大型和超大型制造业,向构建基于“大物物云”、全球一体化的信息发展所追求的企业信息化的高端目标,远非大多数中国企业近期力所能及。但是,每一个企业都有可能在全球物联网、数字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在上述的“九国数字经济比较研究”中,中国在物联网潜力方面居于9国之首,也正说明了对于大多数中国中小企业而言,下一阶段信息化发展的重点之所在。

当前,对中国企业来说,应该将目光关注于全球物联网的发展需求,不失时机地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,以此作为企业数字转型的抓手,一步一步地推进企业的产品走向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,并努力朝着一个新型的数字企业发展。(作者单位: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)



近日,网曝江西安吉几名家长因未批改作业被老师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。老师质问家长:“昨天晚上赚了几百万?”“你这样将来孩子和你一样可悲!”截屏被发至朋友圈,引发热议。学校老师布置家长批改作业,这是超出教师职权范畴的不合理要求。截至目前,我国已有江苏、宁夏等多个省市明确规定,学校老师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,不能要求家长代批改学生的作业,批改作业是教师的事。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 张无娄图